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晋南北朝

巴蜀书社

译注 武秀成

审阅 倪其心

嵇康诗文选译



2 031 0360 3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嵇康诗文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嵇康诗文选译

武秀成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13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魏谯（qiáo 瞧）郡铨（zhān 沾）县（今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集）人。三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其祖先本姓奚，居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因躲避怨仇，迁居于铨县的嵇山（今安徽省涡阳县内），便改姓嵇。

嵇康出生在儒学世家。父亲名昭，字子远，早逝。嵇康由母、兄（姓名无考。不是嵇喜）养育长大。成年后，一直寄居在河内山阳（今河南省焦作市东），达二十年之久。嵇康的妻子是魏沛穆王曹林（曹操之子）的孙女，因而他是曹魏宗室女婿，这一点对于他的一生，或多或少有影响。

！ 嵇康曾做过曹魏的郎中、中散大夫（无职守的闲散文官），故世称“嵇中散”。由于他对司马氏有不满，后退隐，不再出仕。

二

嵇康的活动时代，正当魏晋易代之际，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残酷。这是一个黑暗、险恶的时代。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叡病死，年仅三十五岁。继位的曹芳是个八岁的儿童。曹爽（曹操族孙）和司马懿二人辅佐幼主，曹爽用何晏、邓飏等，谋夺司马懿之权。嘉平元年（249），司马懿用阴谋手段诛杀了曹爽、何晏等人。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又因反对司马懿被逼自杀。其子司马师上台后，继续专权。嘉平六年（254），又诛杀了名士夏侯玄、李丰等，废弃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毋丘俭等在淮南（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起兵反司马氏，司马师率军亲征，毋丘俭战败被杀，反司马的最大的军事力量终于被摧毁了。其弟司马昭上台后，日谋代魏。曹髦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见《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甘露五年（260），曹髦密谋讨伐司马昭，

事情泄密，司马昭乘机杀了曹髦，另立陈留王曹奂为帝。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又在淮南起兵，次年被杀，从此反司马氏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消灭了。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

司马氏集团，一方面采用残酷的手段，血洗曹魏集团成员，又大力倡导“名教”，为篡位制造舆论。他们利用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重视的一些伦理规范，团结内部，诛除异己。例如大官僚何曾倡言“以孝治天下”（见《世说新语·任诞》），而又可给他们心目中的仇敌横加恶名，以致“名士少有全者”（见《晋书·阮籍传》）。文人学士人人自危。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两汉儒学的衰微，沉寂了数百年的老庄思想再度兴盛起来。为了远祸全身，大多醉心于清谈玄理。因此，在学术思想领域里，玄谈之风日炽。《老子》、《庄子》、《周易》，成了名士们研讨的主要对象，时称“三玄”。

当时，玄谈家大都是些“名士”，大约可分为两派。一派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这一派，以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夏侯玄、钟会之流也属此派。后人习称这一些人为“正始名士”。另一派，即嵇康和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

人。他们“相与友善，游于竹林”（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后人习称曰“竹林七贤”。他们从理论到行动，都是提倡“自然”，反对礼教的。汉末以来士人通脱、放达的风气，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鄙视世俗，任情自得，却又各具风神：阮籍佯狂，刘伶病酒，山涛以识度自负，嵇康则高标脱俗，无喜愠之色。有一次，司马氏所宠幸的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嵇康正在锻铁，对钟会的到来，视若无睹，挥锤不止。过了一个时辰，钟会扫兴而去。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双方的对答，似乎不伤感情，但钟会对嵇康的学识盛名常怀忌妒，此时更嫉恨在心。

七贤中人种种对立名教的处世态度，当然是阴谋篡权的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分化瓦解，拉拢七贤。山涛、王戎以其社会地位和姻属联系之故，投向了司马氏，致身通显。嵇康却不惧威逼，不为利诱，始终不屈地与司马氏和他们倡导的虚伪名教进行斗争，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吕巽（xùn 迅）因

奸淫弟妇徐氏之事泄露，心怀鬼胎，反诬告吕安对母亲不孝，吕安蒙冤被捕，放逐到边疆。嵇康素与吕氏兄弟友善，并曾出面调停此事。为伸张正义，他亲去狱中替吕安辩诬。钟会却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见《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此言正中司马昭下怀，于是下令收捕嵇康。嵇康入狱，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以嵇康为师（见《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但早已把嵇康视为眼中钉的司马昭，又怎会放下屠刀？嵇康临刑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说：“《广陵散》于今绝矣。”虽然他怀着无限的遗恨，但神色自若，对这种结局却早已有所感悟了。

三

嵇康的诗文，极力主张听任自然而反对虚伪的名教，这是他诗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司马氏挂着虚伪的礼教招牌，干着篡位的勾当，嵇康不能不首先给它以尖锐的批判。《难自然好学论》一文集中猛烈地抨击了礼法制度。首先，他对礼法的本质加以揭露。“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

墨……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他认为仁义，名分，不过是为了束缚人的思想言行而制定的，“劝学讲文”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手段而已。一切礼法制度都是“至人不存”之后统治者特意设立的。接着又痛斥儒家经典的罪恶作用，“开荣利之途”，使人们竞相追逐私利。他对视“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说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他把学校、诵读、六经、仁义，分别比作“丙舍”、“鬼语”、“芜秽”、“臭腐”，这是旷古未有的嘲弄。在《太师箴》中，他更认为由于统治者以天下为私，怕万众乖离，所以才“攘臂立仁”。这就把一切礼法名教的根源都归结到一个“私”字。这是异常深刻的。司马氏提倡礼教，难道不是为了“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见《太师箴》）吗？

名教和自然之辨，是魏晋玄学的最重要的论题之一。《释私论》就是他抨击虚伪名教的理论性文章。“释私”就是“除私”。什么是“私”呢？

“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不言”就是隐藏真情，“尽言”就是显露真情，无所隐匿。

“公”和“私”的本质区别，就是真和伪，真就是“实”，即自然；伪就是“名”，即“名教”。嵇康认为，“君子无措乎是非”，“无措”就是行为

不拘束于世俗的是非界限，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把“公”和“私”看成是“是非之至”，认为是一切事物成败的关键。

嵇康反对名教，其实质是反抗当时黑暗的现实政治。他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议中，也贯穿了他抨击黑暗政治的意图。司马氏以周公自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则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大将军（指司马昭）闻而恶焉”（见《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善注引《魏氏春秋》）。其矛头所向，是一目了然的。在《管蔡论》中，嵇康则对一向被视为“凶逆”的管叔、蔡叔，给予了全新的评价。他从“三圣之用明”的角度提出问题，说明管、蔡原本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后辅助武庚，功绩卓著，“名冠当时”。只是因为“不达圣权”、“愚诚愤发”才招致反叛之名、杀身之祸。这是一种以古喻今的手法，实质为对司马氏握柄镇压毋丘俭而发。明代张采便说：“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

（见《三国文》）

嵇康的诗文，时时表现出他隐居不仕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司马氏集团的不合作态度。《与山巨源绝交书》，就如一份与司马氏集团公开决裂的宣言书。信中他以许由、季札、子臧自比，表明了“志

气所托，不可夺也”的坚定态度。他的五言诗大多抒写高蹈出世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作者对险恶政治的畏惧和对世俗的愤激。如《五言古意》，描写他和朋友就像双鸾一样远离世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对朋友后来的被迫入仕，则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愤慨。又如四言《幽愤诗》，表明他即使是身陷囹圄，也期望着“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他对隐士生活如此向往，是因为他对那个险恶的时代彻底绝望了。

嵇康诗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养生”。随着汉末以来道教的神仙长生之说的流传，嵇康也深受影响。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诸文中，与时人反复辩难，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住宅是有吉凶的。今天看来，这些都是违反科学知识的。但是嵇康的养生之学，仍然有积极可取的地方。他的养生包括精神和形体两个方面。他指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精神和形体是不可分离的，是互相依存的。养神，是指精神修养方面而言，即要“少私寡欲，无忧无虑”，“体气和平”；养形，指“呼吸吐纳，服食养身”。导引呼吸之术可以锻炼人体机能。“上薄养命，中薄养性”，服用妙药可以保养身体。他的主张节欲，

对富贵、名位、酒色诸事物，都必须加以节制，否则就伤身害性。这些都包含着嵇康对人生哲学思索的真谛。《养生论》很受后世的重视，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些文章中，嵇康也时时对世态人情、虚伪名教予以辛辣无情的嘲讽，同样表露了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他那愤世嫉俗的傲兀气质。

嵇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而且有系统的音乐理论。他的音乐思想集中表现在《声无哀乐论》中。这是一篇专门论述音乐理论问题的长篇巨制。此文就音乐的本质、声与心的联系、音乐的教育感染作用以及对民歌的评价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嵇康认为声音起源于自然，如五色五味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它只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而“无关于哀乐”。他说，“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乐是客观的存在，感情是主观的表现，二者并无因果关系。他也承认音乐有巨大的感染作用，但又认为这只是乐声自然和谐的结果。他认为音乐本身并没有教育作用，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实质上是政治清明、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与儒家“治乱在政，音声应之”的乐教思想形成尖锐对立。因此，他对“郑声”即民间音乐进行辩证分析，给予高度评价。一方面从音乐本质看，认为“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像美色、美酒一样，本身